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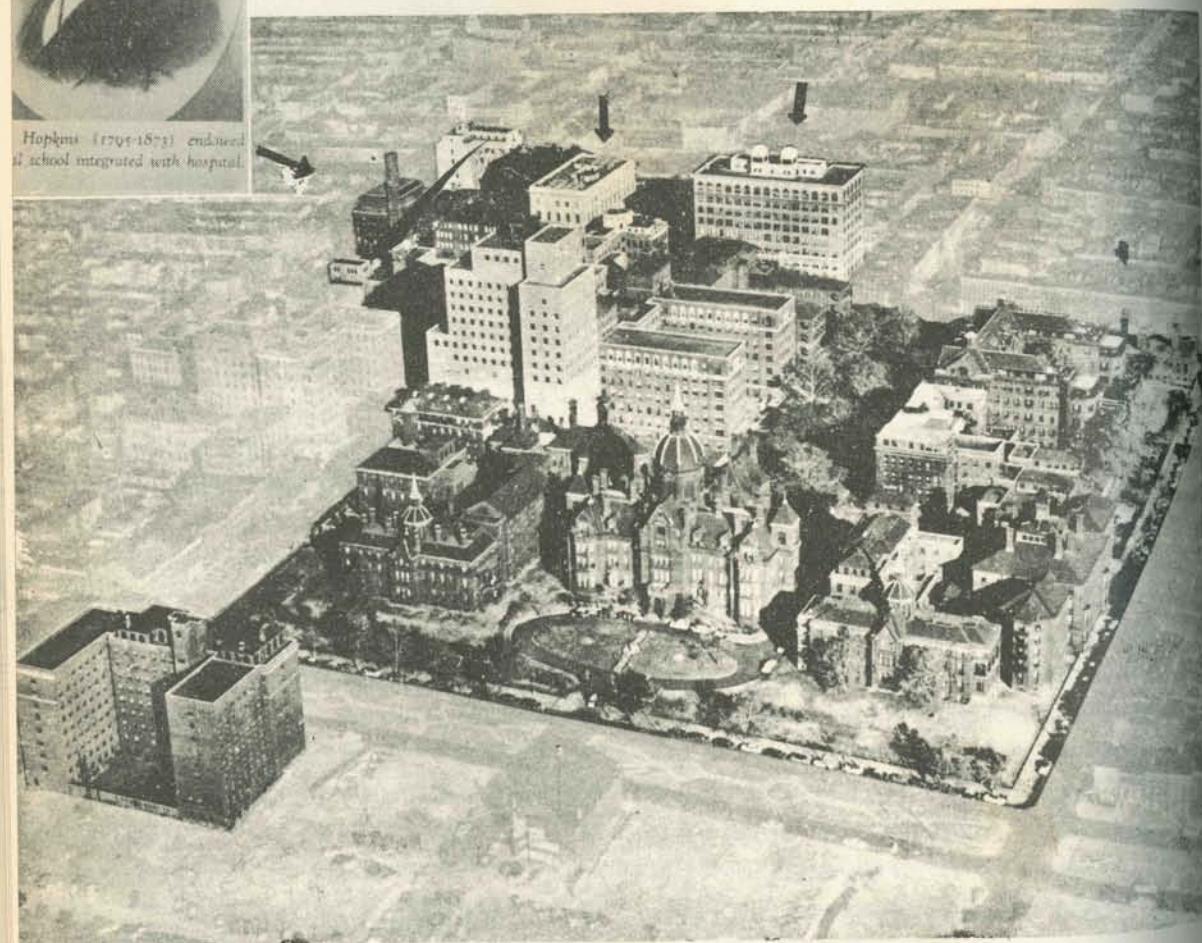
■美國醫學教育改革的故事■

良醫良師

醫四 洪傳岳



Hopkins (1795-1873) endowed
a school integrated with hospital.



照片中央所有建築皆屬約翰·霍浦金斯醫院。

箭頭所指右起為公共衛生學院；中為魏爾瞿醫學圖書館(Welch Medical Library)，

亦即醫學史研究所之所在；左為醫學院。

今天，美國醫學之發達，獨步全球，世界各地的醫師，不遠千里到美國學習。但是一百年前，情形恰好相反，當時美國江湖郎中與祖傳祕方橫行，醫學院有如證書工廠，從舊金山到紐約找不到一所夠水準的研究機構。有志為良醫的青年，必需到歐洲投靠德、法諸國學者的門下，才能得到完善的醫學訓練。

十九世紀末期，一批年輕的醫師崛起，他們大都留學歐洲，回國後不以懸壺濟世為滿足，而要負起他們對美國醫學界的責任。他們相信，唯有醫學教育的改革，才是解決醫學界問題的根本辦法。他們要建立一所新的醫學院，用最新的方法，最好的設備，培養一批新的醫師，然後讓這批醫師分散到全美各地，共同擴展他們提高美國醫學水準的理想。一八六七年，也就是南北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年，一個名叫約翰·霍浦金斯(Johns Hopkins, 1795-1873)的富商做了一個決定，竟使那些理想家得到可以實現他們計劃的機會。

約翰·霍浦金斯大學

Johns Hopkins Univ.

霍浦金斯出生農莊，年輕時家道中衰，只好到巴爾的摩(Baltimore)闖天下。巴城位在華盛頓北方馬利蘭州(Mary-land)，與紐約、費城和波士頓並稱美國東海岸四大港口。十九世紀初期正是她迅速發展的時候，霍浦金斯從雜貨店員幹起，經過五十年的努力，終於成為巴城首屈一指的富翁。七十二歲那年，這位年老的單身漢決定把他的財產，七百萬美元，分成兩部分，一半用來建立一所大學，另一半用來建立一所醫院。這是有史以來，個人對教育界和科學界最慷慨的捐獻。

五年後，霍浦金斯逝世了。生前他指定兩個董事會管理這筆財產，並且留下一封很有眼光的信，指示他們應如何善用這筆巨款。他說：「你們必需建立一所和全美國、全歐洲任何醫院相比，都不遜色的醫院。」「要讓這所醫院有最能幹的院長、技術熟練而且人格高尚的醫師。」「不論年齡、性別、種族的病人都能接受醫院的醫療。」「免費收容貧窮的病人。」「要附設一所菸士學校，使受過訓練的女孩子提供病人最周到的服務。」最後他強調：「我終極的目的和期望，是要這所醫院與大學的醫學院保持密切聯繫。」這封信揭開現代醫院必需具備的條件，吹響美國醫學改革的號角，衆信是他

和一些醫界朋友共同商討的結果。

經過哈佛大學校長艾利奧特(C.W.Eliot 1834—1926)的推薦，大學董事會聘請吉爾曼(D.C.Gilman, 1834-1908)擔任大學校長。吉爾曼畢業於耶魯，在他擔任新職之前，已經服務教育界二十多年，他辭去加州大學教長的職務，來到巴爾的摩，經過兩年的籌備，於1876年一美國開國第一百零一年，主持約翰·霍浦金斯大學開學典禮。

誠如艾利奧特所言：「吉爾曼在霍浦金斯大學給美國的大學開創了一個新紀元，因為他把大學看做研究院。」霍浦金斯大學所以被認為「美國第一所真正的大學」，可以說完全是吉爾曼的功勞。在他看來，過去的大學不過是「職業學校」，他認為大學的功能應該是研究，他不重視宏偉的校舍，也不採用牛津劍橋式的學院教育。霍大成立時的校舍，只是幾棟座落在市區的房子；四十年後，才在巴城北郊建立一個美麗的校園。他効法德國大學的學國，用最高的薪水，聘請優秀的學者，供給他們完善的設備，使他們從事研究並訓練將來的研究者。胡適常提起吉爾曼的成就，他主張中國學術界應集中人才設備，把大學發展成學術的中心，建立大學是研究所的風氣，因為這是使美國成為現今世界研究中心的主因。

約翰·霍浦金斯醫院

Johns Hopkins Hospital

醫院董事會聘請了一位名叫比林(J.S.Billing, 1838-1915)的軍醫來擔他們的顧問。比林中校任職華盛頓美國軍醫署(Surgeon General's office)，一方面是外科醫師，同時也是圖書管理員。他在軍醫署創設的圖書館，今天已經發展成世界最大的醫學圖書館——軍事醫學圖書館(Army Medical Library)。他又編了一份叫醫學索引(Index Medicus)的雜誌，網羅世界最新的醫學研究報告，分類編成目錄，也是今天每一個醫學研究者必需利用的工具。

他和吉爾曼共同草擬醫院及醫學院的藍圖。當時霍浦金斯大學雖然沒有醫學院，但是已經由他開有醫學史、醫學教育和醫學法律的課程，他對將來醫院和醫學院的計劃，都發表在他的課堂演講裏。後來印成專集，被稱為「現代美國醫學教育的獨立宣言」。他不僅讚同霍浦金斯把醫院和醫學院相聯

早期的約翰·霍浦金斯醫院



的計劃，還要進一步把醫院當做醫學教學的中心。

經過十三年的準備，1889年，約翰·霍浦金斯醫院才正式成立。座落在一塊十五英畝的土地上，（北醫占地二十英畝，台大醫院及醫學院共占地四十英畝。）包括十七棟大樓和二百二十張病床。（目前已發展到一千二百病床。）

五個月後，遵照霍浦金斯生前的遺志，在醫院內設了一所菸草學校，先讓學生接受六個月的課堂教育，再施予兩年半的臨床訓練，同時教給他們各種檢驗的方法，這些都是菸草教育上的創舉。

董事會本來想請比林擔任醫院院長。但是他以軍醫署工作在身，沒有接受。頭一年由吉爾曼兼任院長，1890年才聘胡德(H. W. Hurd)來主持院務。胡德很重視病歷卡的儲存，門診部的教學以及供醫師參考的圖書室。尤其重要的是他所創立的病理、檢驗諸部門和住院醫師制度，前者得到魏爾瞿(Welch 見後)的協助，後者得到奧斯勒(Osler 見後)的幫忙對現代醫院的改進，有不可磨滅的功勞。

四博士

The Four Doctors

1884年，比林到紐約去找一位名叫魏爾瞿(W. H. Welch, 1850-1934)的醫師。從前，比林在歐洲考察的時候，曾在萊比錫大學(Leipzig)生理學教授路易(Carl Ludwig)的實驗室，遇過這位醫師。他們在酒店裏喝了好幾杯啤酒，通宵談論有關醫學教育的問題，當時比林就被這位年輕醫師精闢的見解所吸引；回國後，他私下向吉爾曼說他已經找到醫學院的院長了。這次他到紐約去，就

是要請魏爾瞿到巴爾的摩來。

1850年，魏爾瞿出生於康乃狄格州(Connecticut)的一個醫師家庭，少年時醉心文學，立志成為一位希臘語教授，二十歲在康州古老的耶魯大學取得文學士學位，找不到適當的工作，只好轉攻醫學。進入紐約內外科醫學院(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in New York)。畢業後遊學德國，在萊比錫大學師事路易，也就是在這裏，他遇到了比林。後來又到不萊斯勞大學(Breslau)師事病理學家康海姆(Julius Cohnheim 1839—1884)。康海姆是現代病理學開山大師樊孝(Rudolph Virchow 1821—1902)的高足，對炎症做過許多精深的研究。昔人認為發炎時白血球就地形成，康海姆則演示白血球穿過血管壁進入組織，這在炎症的了解上是件很有意義的發現。

魏爾瞿在康海姆的指導下，進步神速，很快就



魏爾瞿(W. H. Welch)



四博士，坐者左起為魏爾瞿，奧斯勒 (Osler)，

克里 (Kelly)，立者為哈斯特 (Halsted)

寫出一篇有關肺部水腫的論文，發表在今天仍是世界最權威的病理雜誌 — 病理解剖，生理及臨床醫學之文獻 (Archiv für Pathologische Anatomie und Physiologie und für Klinische Medizin)，這份雜誌是樊孝在 1846 年創辦的，常簡稱為 Virchow's Archiv)。

兩年後威爾瞿回國，在紐約掛牌開業，但是他沒有忘記研究。他在紐約大學醫學院前身 — 貝利佛醫院附設醫學院 (Bellevue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) 講課，並且設了一個小小的研究室。說來可憐，當時他全部的研究設備，只值美金二十五元，又沒有助手，每當學生要做動物實驗時，只好託他妹妹到紐約城外沼澤地區捉青蛙。

比林告訴威爾瞿，霍浦金斯大學願意以年薪四千美元聘請他擔任病理學教授。威爾瞿答應了，從此開始他服務霍大四十七年的生涯。

不久，威爾瞿又到歐洲去了一次，這次他拜訪維也納、布達佩斯、布拉格等地的醫學院，最後在柏林接受郭霍 (Robert Koch 1843—1912) 的指導，對威爾瞿言，這是一個很可貴的經驗，他親炙於舉世聞名的細菌學大師，對細菌學發生濃厚的興趣，後來他兼任霍大醫學院的細菌學教授，並且發現了會造成氣性壞疽的威爾瞿桿菌 (Welch bacillus)。

1889 年，醫院落成後，威爾瞿立刻設立一個

病理研究所，召集幾位醫師從事研究，這段期間他最傑出的門生包括黃熱病征服者李德和卡羅 (W. Reed 1851—1902；J. Carroll 1854—1907)，細菌學家西蒙·佛勒斯納 (Simon Flexner 1863—1946 見第 59 頁) 以及幾位後來參加霍大醫學院的學者。

威爾霍四出物色教授。第一個是他在加拿大認識的內科醫師奧斯勒 (W. Osler, 1849-1919)

，第二個是紐約的外科醫師哈斯特 (W. S. Halsted, 1852-1922)。奧斯勒和哈斯特聯合推薦婦產科的克里 (H. A. Kelly 1858-1943)。威爾瞿、奧斯勒、哈斯特、克里也就是所謂「四博士」，或稱為「四巨頭」(the Big Four)。

奧斯勒是加拿大人，當時在賓州大學擔任內科教授。關於他的生平，十五期綠杏已經闡了一個專欄，我不想多做介紹。(十五期綠杏譯為奧斯陸，容易和挪威首都 Oslo 相混，所以我依照一般人的習慣譯為奧斯勒。)

奧斯勒多才多藝，在治療、研究和教學上的成就足夠使他列名於人類最偉大的醫師之一。他對現代醫學最重要的影響，是他在霍浦金斯醫院所推行的內科、外科、婦產科住院醫師 (Resident) 制度。他讓醫科畢業學生留在醫院，一面協助醫學院的教學，一面接受更高深的專科訓練，經過五年，甚至更久的學習，這種醫師成為某一科目的專家，

綠杏16期

甚至可以獨當一面，擔任教授。這種制度普遍為世界各大醫院所採用，促成二十世紀醫學界最汹湧的風潮—專業醫（Specialist）興起。

哈斯特和魏爾瞿一樣，先入耶魯，再入紐約內外科醫學院，歐洲留學回來，忙着在六家醫院行醫，還抽空從事研究。為了了解可卡因（Cocaine）的藥理作用，他把這種麻藥打在自己的身上，實驗結果證明可卡因可以阻斷神經傳導，對手術，尤其是牙科手術很有幫助，可是他却因而染上毒癮。他到貝利佛醫院找魏爾瞿幫忙，後者要他暫時休息，把他帶到巴爾的摩為他治療，結果兩人成為很好的朋友。恢復健康後，魏爾瞿推薦他為約翰·霍浦金斯醫院外科主任兼醫學院外科教授。

哈斯特最重視安全，他開刀速度很慢，但是死亡率很低，他大力鼓吹消毒的重要，結果竟產生羅曼蒂克的結局。外科荻士長漢普頓小姐（Miss Caroline Hampton）的兩手，由於經常接觸氯化汞消毒溶液而得了皮膚炎，哈斯特到好時年（Good year）橡膠公司為她訂購一副長的橡皮手套。不久，他發現這種手套對消毒很有幫助，自己也戴了一副，還要求所有的助手都戴，今天，世界上所有的外科醫師都戴了，漢普頓小姐則成了哈斯特夫人。

克里是四博士中，最年輕的一個。畢業於美國最古老的醫學院—賓州大學醫學院，留在母校擔任產科教授，和當時擔任賓州大學內科教授的奧斯勒交情很深，後來隨著奧斯勒到霍浦金斯來。1889，婦科與產科各自獨立，他全力主持婦科，在以鑄治癌的研究上是一位先驅者。

約翰·霍浦金斯大學醫學院

School of Medicine JHU

1890年，醫院已經走上軌道，臨床的教授也已經齊備，約翰·霍浦金斯大學決定儘速成立醫學院。但是他們發現現有的財力無法達成他們的理想。巴爾的摩城的婦女發起盛大的募捐運動，總共收到五十萬美元的捐款，醫學院才得以在1893年秋季宣告成立。巴城的婦女發起募捐，附帶一個條件—準許女子有入學習醫的權利，霍浦金斯大學答應了，在當時，這是很新奇，很大膽的措施。

魏爾瞿擔醫學院的首任院長，他開始施展他改革美國醫學教育的抱負。十九世紀，成立於美國的醫學院有四百所之多，修業期間最長不過三年，以哈佛大學之盛名，每年仍收兩百名醫科學生，教學

之粗濶，可見一斑。加上當時所謂的教授，絕大多數是開業醫師利用業餘時間到學校上幾堂課，完全是兼差性質，根本談不上實驗和研究。

魏爾瞿決心把霍浦金斯醫學院建設成美國醫學教育的楷模。第一步，他要求醫學生必需接受良好的醫前教育。他只接受已經取得大學學位的學生，這樣做等於把醫學院提高到研究院的水準，後來，許多第一流的醫學院都採用這種制度。不過，對立志學醫的人而言，這個條件未免太高了，因為照這種制度，高中畢業以後，至少要經過八年（四年一般大學和四年醫學院）才能得到起碼的醫學知識，實習和住院醫師訓練還不包括在內。大部份的醫學院把這種制度修改為醫前教育兩年，正式醫學教育四年，我國現行制度，就是脫胎於此。

從八百名申請者裏，他挑選十九位幸運者成為第一期學生。他要他們先接受兩年基礎醫學的訓練—解剖、生理、生化、細菌、藥理和病理，這個課程表，今天我們仍然沿用。

病理由他自己擔任，其餘科目，分別由三位美國最著名的研究者來講授。他們都是不到三十五歲的年青人，此後一生，把他們全部的精力放在霍浦金斯醫學院裏。

解剖學家 梅爾（F. P. Mall 1862-1917），密西根大學畢業，留學德國，對胎胚學造詣甚深。1901年，鋼鐵大王卡耐基（Andrew Carnegie 1835—1919）捐出二千二百萬美元，建立研究所，致力美國學術的發展，其中胎胚學部門，就附設在霍浦金斯醫學院，由梅爾來主持。

藥理學家 阿貝爾（J. A. Abel 1857- 1938），密西根大學畢業，留學德國，在史特拉斯堡大學（Strassburg）師事現代藥理學之父許密德伯格（O. Schmiedeberg 1832—1921），回國後，在密西根大學成為美國第一個藥理學教授。受聘霍浦金斯大學之後，研究成果輝煌，分離腎上腺素（Epinephrin），結晶胰島素（Insulin）尤為著名。他終生孜孜不倦，八十一歲那年還在研究腫瘤。他是許多學術團體的發起人，創辦許多一流的學術雜誌，杜聰明博士對他甚為敬佩，四十年前曾在他的研究室裏觀察三、四個月，此事詳見杜博士所著「第一次歐美醫學考察記」。

生理學家 霍威爾（W. H. Howell 1861-1945），他不是醫生，又不會留學歐洲，在霍浦金斯的教授裏甚為特別。霍浦金斯大學生物系畢業後，曾在密西根及哈佛擔任生理學教授。到霍浦金斯

大學以後，以肝素(Heparin)的發現最為著名。他也是終身不懈的學者，到他八十四歲去逝時，還在研究血液凝固的問題。他的學生當中，得到諾貝爾獎的有四位。他以為醫師身分置身於醫學院而表現甚佳，甚至當了一段時期的醫學院院長。後來霍浦金斯大學成立公共衛生研究院，可以說是他和魏爾瞿共同努力的結果。

醫學院剛成立時，細菌學與生化學分別由魏爾瞿和阿貝爾講授，不久另聘專任教授擔任。

「Welch對於美國的病理，貢獻最大，現代著名教授，莫不就學於Welch。」這句話，出現在我國醫學生奉為寶典的「葉曙：病理學」第十頁。魏爾瞿做病理解剖時，奧斯勒、哈斯特等臨床醫師常在旁圍觀討論，這就是所謂臨床病理討論會的由來，後來成為霍浦金斯病理教學的骨幹，造就無數人才。

本來，依照魏爾瞿的意思，臨床教授也應該是專任的，不過這樣做會影響到他們開業的收入，所以沒有成功。像奧斯勒，每週到霍浦金斯醫院三次。一直到1914年，臨床教授專任制才實現，魏爾瞿為了這個理想，奮鬥二十年。

佛勒斯納兄弟

Simon Flexner and Abraham Flexner

魏爾瞿等人的努力沒有白費，很快的，約翰·霍浦金斯醫學院在學術界嶄露頭角。許多人捐出大量金錢，協助他提高美國的醫學水準，其中最重要

的是石油大王洛克斐勒(J.D.Rockefeller 1839—1937)。

據說，洛克斐勒的顧問給特(F.T.Gates)，夏天渡假時讀了奧斯勒所著的「內科之原理與應用」(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)，深覺醫學研究的重要，向洛克斐勒建議以雄厚的財力建立一個可以和歐洲巴斯德研究所、柯霍研究所相抗衡的醫學研究機構。洛克斐勒答應了。1904年，他在紐約捐建「洛克斐勒醫學研究所」(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)。魏爾瞿推薦他的學生西蒙·佛勒斯納(Simon Flexner 1863-1946)來主持。1910年，研究所又附設一所醫院，由霍浦金斯畢業的柯雷(R.Cole)擔任院長。洛克斐勒醫學研究所網羅世界各地的學者到美國共同研究，野口英世就是其中一位；Rh因子則是這個研究所的著名貢獻之一。

西蒙·佛勒斯納的弟弟，亞伯拉罕·佛勒斯納(Abraham Flexner 1866-1959)是約翰·霍浦金斯大學文學士，曾任中學教員多年，後來到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學位，再到歐洲考察教育。1908年寫了一本書討論美國的大學，引起卡耐基教學改進基金會(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)的器重，請他著手調查美國和加拿大的醫學教育。他以一年的時間遍訪一百五十三所醫學院，然後把結果登在委員會第四期會報。在這篇有名的佛勒斯納報告(Flexner's Report)，他指名帶姓的痛斥一百三十二家醫學院，完全不顧那些醫學院對他的恐嚇和攻擊。把他們的污點完全揭露，不到五年，六十多家醫學院關門。對其餘的醫學院，佛勒斯納勸他們以約翰·霍浦金斯醫學院為標準，修改課程，充實設備，願意繼續辦下去的醫學院都照辦了，他們得到美國醫學會(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)的認可，成為合格的醫學院。



西蒙·佛勒斯納(Simon Flexner)

這篇報告，使霍浦金斯醫學院的影響，深入美國醫學界的每一個角落。可以說是一顆炸彈，摧毀美國醫學界的一切陋習，也可以說是一針強心劑，使美國醫學界死而復甦，終於起而領導世界醫學。

佛勒斯納晚年，替美國學術界做了一件大事——建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(Princeto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)，延請愛因斯坦到這裏研究。李振道、揚振寧都是這個研究所的一員。

佛勒斯納和魏爾瞿替那些有心改革的醫學院籌募經濟上的支援，在報告發表後二十五年內，總共

綠杏16期

得到五億美元，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洛克斐勒捐出的。洛克斐勒設立了一個普通教育委員會（General Education Board）來協助他們，委員會的主席是巴特利克（W. Buttrick）。

協和醫學院

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

1913年，洛克斐勒以一億美元，設立洛克斐勒基金會，（Rockefeller Foundation），協助美國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和醫藥、農業的發展。在這個基金會的支援下，霍浦金斯大學的醫師整建協和醫學院。

在中國建設一所國際水準的醫學院，也是給特的建議，給特就是那位主張建立洛克斐勒醫學研究所的人。經過一番調查以後，洛克斐勒基金會認為這個計劃可行，先組成中華醫學董事會（China Medical Board 簡稱為CMB）來籌備，這個組織和普通教育委員會一樣，由巴特利克主持。

原有的協和醫院是一批英國傳教士在1906年建立的。為了進一步研究整建的問題，洛克斐勒基金特地勞動魏爾瞿，西蒙·佛勒斯納以及巴特利克到中國考察五個月。

1915年的這次旅行，使美國醫學的泰斗得以直接接觸中國。在長沙，魏爾瞿對湘雅醫學院的學生做了一次演講。他指出，數千年來中國學生善於背誦，依循前輩的學說而不敢稍有懷疑，但是這是一個以實驗考驗理論的時代，中國醫學生必需培養獨立觀察的能力，利用自己的雙手做實驗，運用自己的智慧來思考。半世紀前，威爾瞿對中國醫學生所說的這段話，今天仍值得我們深省。

魏爾瞿一行，對將來的協和醫學院，抱着無限的期望，依照佛勒斯納的話，「要使協和成為中國的約翰·霍浦金斯」。巴特利克說，協和的目的是要使中國醫師建立中國的醫學傳統，解決中國的醫學問題。他們要讓協和的畢業生成為下一代中國醫學生的老師。此外，他們主張應該儘速使協和醫學院由中國人自己辦理。

1916年，新的協和醫學院開工，其間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暫時受阻，1921年才告落成。這所耗資八百萬美元的醫學院，包括她的研究室和醫院，以約翰·霍浦金斯的水準來看，仍是極為優秀的。許多歐美著名的學者，像魏爾瞿的繼承者——霍浦金斯第二任病理教授馬考倫（W.G. MacCallum

1874—1944 他發現副甲狀腺和鈣代謝的關係），霍浦金斯產科教授伊士特曼（N. J. Eastman）等，都曾擔任協和的教席。

除了協和以外，中華醫學董事會還協助許多中國的醫學院。最淺近的例子是台大醫學院圖書館，乃是以中華醫學董事會八萬七千美元的贈款為基礎蓋起來的。

公共衛生研究院與醫學史研究所

School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,

Institute of Medical History, JHU.

1918年，霍浦金斯大學增加了一個醫學機構——公共衛生學院。這個研究院是以洛克斐勒基金會的捐款，配合醫學界對公共衛生日益高漲的興趣而建立的。其後，幾家美國醫學院起而效法，最早的是哈佛，四年後——1922年也成立了一所類似的機構。

這個學院由魏爾瞿和生理學教授霍威爾共同主持，招收有志於流行病、預防醫學及衛生行政的醫師和科學家，給予專業的訓練，畢業後授與碩士或博士的學位。五十年來，造就了三千個公共衛生專家，其中近半數來自世界上的八十個國家，對世界衛生的貢獻，非任何醫學機構所能相比。即以我國而言，目前衛生司長張智康博士，農復會的許世鉅博士，本校名譽董事，我國公共衛生權威郭松根博士，都是這個研究所的畢業生。

1929年，79歲的魏爾瞿，替美國醫學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。同樣在洛克斐勒基金會的協助下，他建立美國第一所醫學史研究所。

因為在學醫之前，多半曾獲得文學士學位的關係，許多霍浦金斯的醫師，具備高度的人文科學修養。比如婦產科的教授克里，精通英、法、西、德、希五種現代語及希伯萊文和古希臘文。奧斯勒在每星期六晚上，必定邀請高年級學生到他家閒談歷史上偉大醫師的言行風範。

對人文科學的興趣，把他們吸引向當時尚在萌芽階段的醫學史研究。早在1880年，醫院成立的第二年，約翰·霍浦金斯醫學史學會（The Johns Hopkins Society of Medical History）便成立了。許多對這方面有興趣的教授、醫師和學生每月聚會一次，共同研討醫學史上的重要文獻。會中最活躍的分子包括奧斯勒、魏爾瞿和庫辛（H. Cushing）

1869-1939，後來成為腦神經外科的先驅，又是所謂 Cushing Syndrome — 腎上腺機能亢進的發現者。這種風氣傳到美國各地、芝加哥、費城等地的醫師都組成類似的團體；1924年，美國醫學史學會（American Society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）宣告成立。但是，使醫學史研究向前推進的最大動力是魏爾瞿所創立的約翰·霍浦金斯醫學史研究所。

成立時，魏爾瞿的主要助手是圖書管理員葛理遜（F. H. Garrison）。他是約翰·霍浦金斯大學文學士，後來就讀華盛頓喬治城大學醫學院（Georgetown University）。畢業後沒有行醫而任職軍醫署圖書館，協助比林編纂醫學索引。四十年的圖書館工作，使他有機會接觸許多古代的醫學文獻，以他非凡的文學天才和驚人的記憶力，終於寫成醫學史的權威著作 — 「醫史導論」（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）。有了這本書，英語世界才開始有系統的醫學史研究。

三年後，魏爾瞿以八十二歲高齡退休。改萊比錫大學醫學史教授西格里斯（H. E. Sigerist 1891-1957）擔任研究所所長。

西格里斯，對中國醫學生不應陌生。他的名著「人與醫學」，現在列為商務書局人文文庫之一。這本書的英文序由魏爾瞿所作，中文序由胡適所作，本校醫科學生會刊還轉載了一次。西格里斯原籍瑞士，先後在瑞士、法國、德國及英國受教育，他具備廣泛的文學、醫學和哲學知識，精通四種現代語外加古希臘文、阿拉伯文和拉丁文。1905年，德國醫學史權威蘇德夫（Karl Sudhoff 1853-1938）在萊比錫大學建立世界第一個醫學史研究所，西格里斯就是他最傑出的門生。後來西格里斯繼承蘇德夫的教席，他在萊比錫大學對醫學生所做的演講，就是「人與醫學」的原稿。他在霍浦金斯擔任教授達十五年之久，1947年退休回瑞士，本來要用晚年寫一部完整的醫學史，可惜沒有完成，在1957年死於山居別墅。

出身約翰·霍浦金斯的醫師，受到名師的影響，許多致力醫學史的研究。對我們較熟的，像梅玖（R. H. Major）、坎薩大學（Kansas）內科教授，本校同學採用的「物理診斷學」（Physical Diagnosis）便是他寫的。他也是該大學醫學史學科主任，他的名著「醫學史」（A History of Medicine）分上下二冊，出版於1954年，是一本文筆簡潔，內容豐富，適宜參考也適於入門的書籍。還

有原籍德國的阿克涅特（E. H. Ackerknecht），現任威斯康辛大學醫學史主任，1955年著「醫學史概論」（History of Medicine），這本書最近由戴榮鈴先生翻譯為中文，中國醫藥研究所出版，所長兼國防醫學院醫學史教授李煥榮先生寫了一篇近乎「醫學史簡史」的序文。

上述幾本醫學史書籍，本校圖書館都有。

既為良醫·復為良師

Doctor: The Healer and Teacher

自從佛勒斯納報告發表，迫使美國醫學界重新整頓以後，今天，美國有許多醫學院能和霍浦金斯並駕齊驅。魏爾瞿所訂之課程表，普遍為醫學院採用了半個世紀，今天却一再被批評為不合時代需要。西儲大學（Western Reserve）新創的學法，不再分別講授解剖、生理、病理、細菌等課程，而依照器官系統把所有相關的知識混合教學，這無異於對霍浦金斯教學提出挑戰。

但是，誰都不能抹殺這所學校的貢獻，因為她是一切成就的開始。後世的學者也不能忘記那批敢於懷抱理想並努力實踐理想的醫師，因為我們都蒙受其賜。

考 Doctor 一字，乃是中世紀時，對那些碩學大儒的稱呼。凡得到 Doctor 學位者，終身為大學之一員，永遠留在教育界為莘莘學子的表率。即以中文而言，亦將醫師兩字並舉。所以魏爾瞿等人，才是真正 Doctor，真正的醫師，因為他們為病者之良醫，復為醫者之良師。

即將定稿時，又在最近出版的北醫學報，讀到徐院長的幾句話：「目前，具有世界性的學術權威地位，堪為學報表率者，當推美國 Johns Hopkins 大學醫學院學報。」由此看來，院長對北醫學報的期望，無非就是到霍浦金斯的境界。愚意以為，我們能有多少成就，端看我們能由這些締建偉業的良醫良師，學到多少抱負，多少熱忱，和多少任重道遠的勇氣，謹以此結束本文。

